本世纪以来医学史研究的两次转向与回归

Two Turns and a Return in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张树剑 /ZHANG Shujian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100700）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中图分类号：N09; C532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12.009　CSTR: 32281.14.jdn.2026.12.009

今天的医学史学术会议上，除了医学院的学者之外，还能遇到来自历史系、科学史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公共卫生学院甚至外国语学院、文学院的研究者，这在其它学科会议上是比较少见的。医学史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以其对生命本身的关切，吸引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加入，也导致了医学史研究的多次学术转向。张大庆老师曾经对20世纪以降医学史研究的“转向”做过讨论，如语言转向、社会转向、文化转向、身体转向、物质文化转向等。我这里主要想谈一下本世纪以来医学史的两次重要转向。

一、医疗社会史转向与人文转向

向前推30年，中国大陆的医学史研究只是医学院中很小一部分研究者的工作。其中，中医药院校中的研究机构与人员更多一些，这与中医学比较重视传统知识有关。研读与学习经典医籍是中医学习的重要任务，所以，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设中医医史文献学、中医文化学等二级学科，院校中普遍建有中医医史、文献等相应的教学科研机构。西医院校中往往只有医学史教研室的建制，人员相对较少。医学史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医学机构主办的平台，如《中医药文化》《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等。与之相适应，相关的学术组织如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中国科技史学会医学史专委会等，其成员也多以具有医学背景（尤其是中医背景）的学者组成。

本世纪初，大陆的医学史研究受到港台学术的影响，发展出了医疗社会史这一方向。余新忠于2001年发表“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一文，文中说：“疾病医疗社会史目前还不过是中国历史学这片园地里一棵刚刚破土的幼芽。希望也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来关注、哺育她，促使其茁壮成长，最终成为参天大树。”如今看来，这一预见深有见地。医疗社会史一经提出，就受到医史两界的认同，经过20余年的培育，该方向已经成为医史两界的重要研究领域。

2021年，南开大学承办的首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委会学术年会的主题即是“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即使在疫情之中，也有300余名学者参会，蔚然大观。相应的学术平台也建立起来，上海大学顺应时势推出《医疗社会史研究》学术集刊，以特邀主编制迅速罗致了一批海内外优秀稿件，现在这本集刊已经进入了CSSCI集刊序列。《中医药文化》也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18世纪针灸知识在欧洲的传播、接受与重塑研究”（项目编号：25AKX008）。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5日
作者简介：张树剑（1973–）男，山东章丘人，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史、针灸人文。Email: njrb@163.com

此时发力，开辟了医疗社会史专栏，并以工作坊的形式组稿。

这是本世纪以来大陆医史研究的一次最重要的转向，其意义在于医史研究已经不限于医学界自家之事，历史学者合法地登上了舞台。医史两界学者虽然使用的概念工具、学术语言各有不同，但是最终关切到了相同的问题。参考曲安京先生提出的“问题域”概念，我们可以理解，原本隔行如隔山的医学学者与史学学者在相同的问题域下，成为了密切的合作者。

大概在近十年，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医史研究有了一个新转向，即医学人文转向。医疗社会史研究引发了相关的人文论题，除了医学文献的拓展，还有医学文化、医学伦理、医学叙事、医学知识传播、医学法律法规、医学与社会、医生修养等，新论题层出不穷。医学史研究的人文或文化转向成为特征。

相关的学术机构也在建立或者更名，如陕西师范大学建立了医学与文明研究院，浙江中医药大学设立了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更名为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则整合中医文献、医史等教研机构，成立科技人文研究院。西医院校则倾向于将医学史、医学伦理、医患关系、医学心理学等教研机构整合进入医学人文学院，借人文之名整合相关研究，同时承担着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的任务。

医学人文的繁荣令相关研究的成果增加，学术平台也纷纷建立，近年来新创刊多种学术集刊，有《中医典籍与文化》《中医药历史与文化》《医学与文明》《中医药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医药文化理论与实践》《中医药文化研究》等。这些集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作者群体背景多元，文章论题更是博采。从集刊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文化替代历史成为关键词。

所以，本世纪以来的医学史总体而言有两次转向，一是由医学文献与学术史转向于医疗社会史，这一转向标志着历史学者正式进入了医史领域；二是由此进一步发展出的人文转向，其标志是多学科人文学者加入了医史研究，医学史研究与教学的捆绑更加紧密。

二、转向的机遇与问题

医学史的两次转向，带来两个相互纠缠的后果。一方面，医学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资源。医学史果真成为了显学，无论是国家基金还是期刊文章，医学史都成为热点，以青年学者为作者主体的优秀跨学科的学术著作也陆续出版。传统的医学文献的研究也获得了巨大支持，如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医古典文献整理保护与出版工程《中华医藏》的启动。部分医学院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等在发力建设“人文医学”学科，医学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

另一方面，医学史研究的转向与拓展，也令学科边界变得模糊，“医学史究竟是什么”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是部分科技史学者提出的碎片化的忧虑。医学史人文转向的另一个隐忧是医学史工具化。史学研究固然有教育功能，但是其价值观的核心是追求“理解”，与人文教育追求的“教化”之间，存在着不易弥合的张力。培养有人文情怀的好医生，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医学史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的“无用之用”，是让知识自己说话的求真意义。

三、以知识为核心的医史回归

回顾本世纪以来的医学史的两次转向，是医学史由自身出发的多元拓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医学人文学者的抱团取暖。医学史无论是在医学，还是史学领域，原本都是一个较小的领域，从业人员不多，在大学的科研与教学体系中比较边缘，中医院校尚好，有一定的医史文献研究传统，西医院校往往沦为可有可无的公选课。在这一情状下，医学史与相关的人文学者互相接纳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自觉。另一方面是公众与政策机构对医学人文的需求加强。本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多次疫情，医学史与医学人文的学者在疫情之中钩沉历史，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定的智慧支持。公众也由

（下转第 25 页）

四、碎片化论题的再审视

对中国传统工艺研究发展历程的考察，可得出以下基本判断：该领域不仅没有走向碎片化，反而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和整合性发展态势：《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等重大文献编纂工程实现了知识的系统汇集；传统工艺理论不断拓展和深化推进了学术话语的体系建构；跨学科融合为特征的学术生态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这一系列发展表明，知识的整合与重构在科学技术史学科特定学术领域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成为主导趋势。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经验表明，当学界形成共识、具备组织化条件并善于使用技术手段时，所谓学科“碎片化”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参 考 文 献］

[1] 张柏春. 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的碎片化趋势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6, 48（4）: 1–3.

[2] 冯立昇. 挑战与机遇：科学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知识的整合重构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6, 48（4）: 28–31.

[3] 潘鲁生. 关于构建中国“手艺学”的问题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1）: 70–72.

[4] 马知遥、王明月. 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视域拓展 [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4）: 376–382.

[5] Law, J. 'Technology and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 The Case of Portuguese Expansion'[A], Bijker, W. E., Hughes, T. P., Pinch, T. J.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105–127.

[6] 李泽厚. 哲学纲要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35.

[7] 李晓岑. 论传统工艺的传承及传承人的培养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 39（5）: 113–119.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

（上接第 27 页）

此增加了对医史的理解与期待，这也促使更多的学者进入了医史领域。

所以，医史研究的多元化是学科发展的趋势，而因此带来的碎片化与工具化的隐忧，也是学界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近年以来，医史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回归医学知识的重要性。医史研究可以多枝嫁接，但是树根不能变，这个树根就是医学知识。强调知识作为核心，并非要回到医学文献、理论研究的学术史的道路，而是要通过知识作为纽带联结起医史研究各个方向。除了知识本身在不同的语境下解读之外，知识生产与流通的背景、人群、机制，以及存贮方式与工具等等也是重要内容。这一知识史的角度打破了传统的内外史研究的疆域，为医学史重塑了边界，亦可回应“没有医学的医学史”的质疑。同时，保持了医学知识的核心，就是保留了对知识的追求，保留了学术研究求真的本性，自然就破解了将其单纯地视为教育工具的担心。

本世纪以来的医学史研究的多元转向与学术回归，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学科边界与学术功用的探索。如果保持开放性的同时，坚持医学知识之根本，医学史将从一个边界模糊的交叉地带，转变为一个内涵稳定，关切凝聚的重要学术领域。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